

THE HISTORY OF

上海史

(第一卷)

SHANGHAI

[英] 兰宁 库寿龄 著

朱华 译

THE HISTORY OF

上海史

(第一卷)

SHANGHAI

[英] 兰宁 库寿龄 _____ 著

朱华 _____ 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史. 第一卷/(英) 兰宁,(英) 库寿龄著;朱
华译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20.1

ISBN 978-7-5458-1869-7

I. ①上… II. ①兰… ②库… ③朱… III. ①上海—
地方史 IV. ①K29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30886 号

责任编辑 顾 佳

封面设计 汪 昊

上海史(第一卷)

[英] 兰 宁 库寿龄 著
朱 华 译

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31.5
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869-7/K.354
定 价 188.00 元

本译著系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《外语文献中的上海（1843-1949）》成果之一

译 序

本书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资助的《上海史》第一卷，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上海公共租界史。用“上海”代指“上海租界”，似乎只有租界才算“上海”，是那个时代外国著作家的一种典型傲慢，即使一些痛恨殖民主义行径的作家也不例外。

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总体价值，熊月之著《上海通史·导论》已有中肯的介绍和评价，读者自会参考，故不再赘言。本文仅对该书曲折的成书过程、写作的特点以及观点见解方面的特异之处，作一些必要的提示。

作者乔治·兰宁 1852 年出生于英国，1875—1889 年间担任上海英华书馆总教习，1890 年出任共济会创办的西童公学校长，并在该校移交给工部局后继续担任校长。1907 年，兰宁卸任校长，以略低于校长的薪酬接受工部局的聘任，从事上海租界史即此书的写作。但兰宁的进展显然极其缓慢，以致工部局董事会在 1916 年专门作出决定，要求他辞去其他工作，专心从事此书的写作。1917 年 5 月，兰宁保证在年底完成第一卷，内容下限为 1850 年。然而翌年 1 月，工部局再次要求兰宁说明未能按时交卷的原因。从正文中引用了 1919 年出版的文献来看，正文的初稿应该完成于 1919 年的某个时间。随后，可能是根据审阅人的意见，兰宁开始补写全书的注释。但他仅补写完前五章注释，就于 1920 年 1 月去世。工部局再次研究此事，董事们一致属意著有《中国百科全书》的库寿龄牧师接替兰宁的工作，并可能是鉴于兰宁的教训，明确希望他在三年内完成本书的后两卷，并规定内容下限应为 1920 年。本卷经库寿龄补完注释、附录，并经工部局董事们审阅后，于 1921 年初由别发印书馆出版。然而，库寿龄又在 1922 年 6 月去世了，内容下限为 1900 年的第二卷最终由其遗孀完成，于 1923 年出版。所以，这部《上海史》是未完成的著作。

从本卷由库寿龄完成的众多注释、附录中可见，他对兰宁撰写的正文，即使观点截然不同，或者发现存在明显的计算错误或表达缺陷，也不作丝毫更改，而是一律以注释进行反驳或说明。因此，本卷正文及前五章的注释完全是兰宁的个人作品。

本卷的写作风格，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：

第一，偏重追本溯源，喜欢“从头说起”。本卷共 53 章，第一部分导论 8 章，实际上是对于古代中国的某些比较研究。第二部分标题是“广州，上海的摇篮”，从内容上看，应该是从第 9 章到第 27 章，即介绍上海开埠前的中西交往。第三部分应该是从第 28 章开始，即正式进入上海历史。但可能遗漏了标题，所以现在的第二部分一统到底，完全名不符实。换言之，本卷原正文共 471 页，真正讲述上海历史是从过了一半多篇幅的第 248 页开始。不但如此，各章对所涉及的大量名物，如商业、丝绸、治外法权等，也存在着类似的不惜篇幅寻根问底的写法，而且往往还要从外国说起。例如，写珠江三角洲，从尼罗河开头；考察丝绸贸易，可以看到嫫祖；叙述基督教在中国，甚至涉及了耶稣的降生和复活。按照作者的说法，要是准许想象和探索的话，泥城之战的远因完全可以上溯到唐代或者汉代，尽管他抵制了这种诱惑。这种海阔天空、古今中外、肆意纵横的风格，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。一位当年的评论者即不无刻薄地挖苦说，导论中如有专门论述月亮的一章应该更加合适，因为上海直接依靠潮汐的影响。

第二，偏好“以论带史”，忽略甚至常常故意淡化对基本史实的陈述。兰宁知识渊博，视野开阔。他的追本溯源，往往就是从欧洲史、英国史角度的比较观察和评论，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评论，包括对宗教、英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借题发挥等。完全可以断定，评析月旦，阐释各种个人学术见解和抒发强烈的个人胸臆，就是他的主要旨趣所在。因此，与这种评论无关，或者关系不大的历史发展大致过程和基本史实，他往往惜墨如金。也就是说，他很少试图把故事讲述完整，或者交代清楚。尽管此书篇幅浩大，尽管从引证资料来看，有理由相信他熟稔史实，但很多基本的历史梗概或重要事实，不是语焉不详，就是只字不提。不同的史家对于应该还原哪些历史细节，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。但兰宁的这种偏好，肯定不适合这一领域的入门者，则毫无疑问。就像不熟悉《资治通鉴》或者基本史实，就很难以《读通鉴论》为入门读物一样。

同时应该指出，大概也就是由于这种论重于史的偏好，全书的内容安排颇有凌乱之感。常见的问题，就是叙述很少讲究时间顺序，常有颠三倒四的现象；相关的史实散见于多章，一些章名与内容脱节；有些观点、例子，甚至故事经常重复。个别重复甚或前后抵牾。实际上，就历史撰述的严谨性而言，此书不无瑕疵。译者深

感头痛的，就是其对征引论著名称的写法过于随意，常常“短斤缺两”，甚至写错了他自己发表论文的刊物名称。

第三，有些表述，尤其是批评比较隐晦。这是本卷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感觉，也是译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。不知是假定读者都像他一样对史实了然于胸，把话说清楚会有辱读者智商或有损本书的高雅格调，还是一种其实含有微言大义的“春秋笔法”，作者常常故意用某种委婉的、暗指的或省略的方式，来表达一些并不为众所周知的史实、人名、书名。兰宁文学修养深厚，行文中不但大量引用《圣经》等英文名著的典故，有时还会进行不露声色的讽刺挖苦。如在抨击基督教时，称“尽人皆知，欢迎的热度与友好的程度成反比”；为了形容中国官方对外国领事的憎恶，还装作一本正经考证的样子说，领事的中文词根可能是“搜”、“司”，或者“唆”。

简言之，这是一部文学色彩特别浓厚、充斥着论断评判而非讲述论证的史书，而且是体例明显松散、难免漫不经心之嫌的史书。

至于作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，熊月之教授的说法一针见血，“此书是受工部局资助写成的，立论从租界出发”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从英国租界出发的。与当今史家喜欢标榜中立客观不同，作者在书中坚持以第一人称代指英国，我们或我们的，通常就是英国或英国的，立场绝对鲜明。尽管作者对具体的英国政府、政客、官员均无不微词，但在辩护英国殖民主义行径的说教方面，却很少温柔敦厚的风度，有时甚至粗鄙到了厚颜的地步。例如，断言英国从无对外扩张领土的愿望，力辩鸦片战争的说法完全来自传教士的杜撰，应该称之为“平等战争”；颀颜宣称唤醒中国的“精灵王子”是带着最亲切友好的意图而来的，虽然一身战争披挂，最大隐衷却是和平，等等。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理解的“政治正确”。《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》表明，此书出版前，确实经过了全体董事的审阅。要这些“上海脑筋”的典型代表承认自己的立足点完全没有道义基础，当然无异与虎谋皮。尽管随着时代的潮流，殖民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历史博物馆，但这种不足为道的老生常谈至今仍然不失其思想史素材的价值，却是不言而喻的。

然而，作者也有一些不同凡响，甚至令人惊讶的观点和思想倾向。

第一，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有很高的评价。本卷的学术基础，显然是到那时为止的西方汉学。作者据此采撷或提出了一些颇为惊世骇俗的观点。他固执中西文明同源的信念，自己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语言学研究论文，坚决反对把中国视为另类

的某些流行看法。他几乎是在喋喋不休地强调，历史上的中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标准，至少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，尤其是英国。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过去而自豪。至于中国现在的落后，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绝，处于新观念的传播圈之外，从而由停滞走向了倒退。而且，西方谴责最多的中国弊病，包括吸毒、腐败、酷刑等，在他看来其实也都是西方至少是英国也曾深陷其中的弊病。“他们的缺陷，就是我们的缺陷，他们的恶习，就是我们必定承认的罪过。”他为此列举了大量有关英国的事实，包括一些个人的亲身经历。他的结论是，中西之间今后的友好交往，需要以相互了解而不是相互无知为基础。不但如此，他甚至一再设问，英国的真正崛起，也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，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二个国家呢？一百年后的今天，如何看待这些曾经的一家之言，也许仍然是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。

第二，表现出强烈的反基督教倾向。在本卷中，作者明显偏离上海史、中国史的主题，用相当大的篇幅表示对基督教特别是其基本教义的不屑。他认为科学已经证明，从来就没有堕落，也没有神迹，因而言词激烈地抨击基督教对思想的禁锢和对华传教的荒唐。他推崇中国文化，一个基本理由，就是孔子乃“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不可知论者”。中国因为没有《圣经》，所以逃脱了正教强加给欧洲的诸多苦难。实际上，他对天主教和新教一概表示蔑视，举发传教士的劣行，冷嘲热讽，不遗余力，甚至暗示中国官绅对西方的警惕、排斥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传教士的活动引起的。这是否与兰宁的共济会背景有关，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但即便如此，一部官方正式资助的史书中出现这么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，却无论如何令人惊讶。至少，这提出了一个工部局与传教士、大班们与宗教信仰存在着怎样关系的重大问题。

第三，竭力为鸦片贸易开脱。鸦片贸易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，也是上海开埠初期的主要经济活动。本卷虽然也有专门论述毒品、走私的篇章，但作者一直力图证明的却是：首先，鸦片并不严重危害健康，吸毒嗜好与酗酒类似；其次，中国的鸦片古已有之，绝非英国人首次并强行输入；复次，中国的禁烟没有道义成分，纯粹是出于重商主义理念的杜绝白银外流；最后，中国的皇帝和腐败官员才是鸦片泛滥的元凶，甚至走私鸦片也是反抗专制和税收腐败的正当权利。同时，他在陈述中尽可能地淡化了鸦片问题。例如，按照马士的说法，上海开埠初期的三项大宗商品是

鸦片、茶叶、生丝，鸦片的输入值有时竟超过丝茶出口的总额。但在兰宁笔下，三项大宗商品却成了茶叶、生丝和棉制品。在专门论述走私、航运的各章中，极少见到鸦片贸易的数量、价值概念，甚至连趸船都只字未提。作者在称颂或者介绍众所周知的鸦片巨头渣甸、马地臣、颠地及其企业时，对他们与鸦片的关系往往讳莫如深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作者亏欠的显然不止史德了。因为，早在1912年就通过了《海牙禁烟公约》，鸦片有害、必须逐步全面禁烟已是本卷写作时期的国际社会，至少是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共识。当然，工部局长期对此无动于衷，至少在本书出版时，鸦片买卖依然是在租界内得到充分保护的合法大宗生意，何况大班们的前辈，恐怕都同鸦片不无关联。但即便如此，一位学富五车、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敢于在这种问题上如此放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仍然发人深省。

当然，此书的具体观点远远不止这些。这毕竟是一部“以论带史”的著作，各种有趣或奇特的具体观点、论断比比皆是。译者认为，这也正是这部百年前的著作仍然值得翻译、阅读的主要理由。

本译著系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“外语文献中的上海（1843—1949）”（编号：11&DZ102）成果之一。为了便于研究者的参考利用，译文采取尽量遵从原文的原则。原文对中国历史颇有误解或表达不确之处，包括将华夏族与中国人混淆、对少数民族采用蔑称等，但这毕竟是作者或当时学界认识水平的反映，且想来读者自会明察，故一律照原文直译。但为了便利阅读，译著对原注释作了变动和增加。一是原书附于正文后的尾注，一律改为脚注并标明“原尾注”，表述及格式均不变；个别用括弧附于原文句末的附注，亦改为脚注。二是原文提到的大量人名，往往是有姓无名，阅读非常吃力，译者主要依据维基百科等，对其中的可确认者加注了身份和生卒年代。三是译者对所能查到的原文所引典故、文句，加注了出处。四是添加了一些译者觉得需要说明的个别地名和其他情况的注释。简言之，全书未加其他说明的所有脚注，均系译注。原著引用的文献，凡能找到中文原本或可靠中译本者，均直接转录，并用译注标示出处。如此处理的原因，既是为了便利研究者，更是想借此表达对译界前辈的敬意。惟全书的《圣经》译文，全部依据网络上查到的“现代本”与“和合本”，不再逐一注明。外国人名、企业及机构的名称，均从习惯译法，主要依据黄光域编《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》和中国社科院、上海社科院有关研究人员出版的译著；未查到习惯译法者，则按新华社编译名手册音译。船舰名称

历来有音译和意译两种，本译著按照依次遵从中文历史文献、现有译著和意译的办法处理。书末附有译名表供读者对照，其中的部分人物全名，系根据有关资料补充。全书涉及地名众多，有些中国地名还有专门的英语名称。凡译者觉得生僻、中英有别或回译尚难确定者，均附以原文。本卷的索引对于理解、使用本书十分有用，惟检索点并不涵盖全书，且颇有重复，乃按照原文译出，删去完全相同的数则正条，并改为译本页码。原书所附图片和地图，因价值不大，全部舍弃。

最后想说明的是，译者虽然治上海史有年，但英文程度相当有限。翻译这样一部文学色彩非常浓厚的专著，确实常感力不从心。衷心感谢金良年学长的鼓励与帮助。译文错误失当之处，恐怕万难幸免。衷心期待方家的批评指正。

前 言

现代上海已诞生将近一个世纪了。近年来，经常提出需要一部综合性论述上海外人租界所在之地历史、政治、商业各个方面的史书。由于这一领域现有的优秀出版物中尚无此种著作，鉴于其浩大的体量，应向这种私人的事业辅之以公共资助。因而，工部局在1906年以自己的名义委托兰宁先生承担本书编纂。他把超过十三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项使命，在搜集、梳理、编辑的史料过程中，查遍了一切可用资源，以致三卷中第一卷的大部在今年1月准备付梓时，他竟非常可悲地去世了。幸运的是，为了赙续并最终完成兰宁先生献身了多年的工作，工部局已能够得到库寿龄先生的服务。

尽管可以理解，许多有趣的事件被不可避免地省略了，工部局仍希望本书是对上海有记载历史的有用补充。

工部局对所有在史料和信息方面提供了善意帮助、向兰宁先生和库寿龄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工部局总办 利德尔

1920年8月

目录

前言 / 1

第一部分 导 论

- 第 1 章 中国和西方 / 3
- 第 2 章 两项特别比较 / 13
- 第 3 章 过去的中国政府 / 19
- 第 4 章 中国的宗教信仰 / 25
- 第 5 章 基督教在中国 / 35
- 第 6 章 语言的证据 / 49
- 第 7 章 法律的相似 / 56
- 第 8 章 19 世纪的对比与比较 / 66

第二部分 广州，上海的摇篮

- 第 9 章 自然环境及其精神影响 / 79
- 第 10 章 与西方的交往 / 85
- 第 11 章 东印度公司 / 91
- 第 12 章 英国使团 / 98
- 第 13 章 垄断贸易 / 106
- 第 14 章 中国水域的英国航运 / 117
- 第 15 章 商馆中的生活 / 122
- 第 16 章 风暴的汇聚 / 135
- 第 17 章 风暴的汇聚（续） / 145
- 第 18 章 林大人与义律上校 / 155
- 第 19 章 毒品的故事 / 165
- 第 20 章 战争 / 172
- 第 21 章 这是一场鸦片战争吗？ / 184
- 第 22 章 战争的其他问题 / 194
- 第 23 章 治外法权的基础 / 201

- 第24章 治外法权的实行 / 207
- 第25章 美国人与广州的关系 / 212
- 第26章 《南京条约》 / 219
- 第27章 中美《望厦条约》 / 224
- 第28章 扬子江的馈赠 / 233
- 第29章 上海的古代与前辈 / 240
- 第30章 夺取吴淞 / 245
- 第31章 占领上海 / 250
- 第32章 租界生活的曙光 / 255
- 第33章 早期的立法努力 / 264
- 第34章 紧张的岁月 / 274
- 第35章 万国商团的诞生和泥城之战 / 281
- 第36章 工部局的诞生 / 291
- 第37章 走私犯的天堂 / 300
- 第38章 走私犯的天堂（续） / 305
- 第39章 帝国海关 / 311
- 第40章 东西方的贸易变迁 / 320
- 第41章 领事与领事 / 331
- 第42章 商会 / 338
- 第43章 上海的航运 / 342
- 第44章 上海的航运（续） / 353
- 第45章 上海货币 / 360
- 第46章 早期的贸易经历 / 368
- 第47章 三大商品 / 376
- 第48章 金融 / 392
- 第49章 社会生活 / 395
- 第50章 宗教和教育 / 405
- 第51章 通信交通 / 413
- 第52章 “法租界” / 419
- 第53章 有影响的商行和著名人士 / 425
- 附录 / 437
- 索引 / 445
- 译名表 / 461

第一部分

导 论

第1章

中国和西方^[1]

中国人来自何处?^[2] 这个人们不断地讨论的问题,无疑将继续讨论下去,直到获得最终结论所需的充分资料。因而,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武断说法,不是证明了作者的广博超过了常人,就是证明了根本不主张谦逊态度。然而还是可以说,有一些证据表明,中国人来自比他们现在住地更靠近太阳落下的地方,而如果真是这样,他们与西方人之间就并不存在很大的总体差别。我们自己的读物已经表明,亚述人、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不少事物与中国人相似。比较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也许很快能对这些事物表达斩钉截铁的观点。我们将在后面提到一些历史发展的相似性、习惯法和社会惯例发展的相似度、某些语言关系证据的可能性。如果这些观点

[1] 原尾注:第1章:权威典籍——《大英百科全书》(*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*),第2卷,第6卷;丁甦良博士:《中国的觉醒》(*The Awakening of China*);赫尔莫特博士编:《世界史》第2卷(*The World's History*);哈登博士:《民族迁徙》(*The Wanderings of Peoples*)。

[2] 原尾注:第1页第1行:“中国人来自何处?”

丁甦良博士说,尚缺乏断然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资料,但可“大致确定”是从西北进入的。李希霍芬推测,塔里木河流域也许是中国人进入中国的中心;斯坦因爵士最近在现已遭受中亚严重干旱的相邻地区探索,据说有很多发现,表明塔里木通道是一条中国和西方广泛使用的道路。

大英博物馆和国王学院的道格思先生在最新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论述中国人起源的文章中,提到了缺乏证据,然后说:“因此,我们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观点是,尚不可知。”但他讨论了中国的“古代世敌”匈奴和“阿提拉汗的祖先”,因而指出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项历史联系。

另一方面,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第2卷亚洲历史的文章作者艾略特爵士明白地指出:“中国人来自西方,尽管还不知道是多远的西方。……巴比伦王国和中国之间的某些关联获得普遍承认。”(第750页)还有,(第751页)“普遍承认,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巴比伦王国存在着某些关联,但精确的性质仍不确定”。然而,中国人显然来自西方。若干年前,本书作者与就此写过两本小册子的爱资拉先生一起,对亚述和埃及的历史进行了一些仔细的研究,得到的深刻印象是,中国和这些国家相似性的唯一解释,就是假定这些民族或者其祖先,曾经在某一或某些时间内有过密切接触。

哈登博士在其著作《民族迁徙》中表明,建造坟墓的乌孙人最初来自塔里木河流域附近,后迁入中国北方,其另一个分支向西进入中欧。关于这个话题,我们必须回到论述语言证据的第6章。

能够成立，将是对最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实质性帮助。

罗马是古代唯一能暂时同中国相提并论的西方帝国，而且仅仅是在范围方面。除了面积相似之外，其他都是对立的，不可比较。罗马可以征服，但不会同化，而且极少试图灭绝。对罗马新获得的疆域而言，屈服和准入几乎同时发生。今日的仇敌就是明日的朋友和盟友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大英帝国的惯例显示了同样的智慧。可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对现在称为中国土地上的大量土著，却不是灭绝就是同化。我们认为，很可能在沿海省份发生过匪夷所思的同化，这也许是山东、广东的人民和方言存在着如此广泛差别的一种解释。也许土著是被从内地逐渐驱赶到沿海的，因“进退维谷”而奋力抵抗，以致中国人相信，谈判议和比代价高昂的征战更为可取。在上海所属的吴国，当时的各个民族显然融合得非常彻底，以致纯粹的土著现在了无踪迹。如今，我们在更南边的广东省才能找到两个或更多可分辨的民族，实际上，该省留下了广州人性格和习惯的明显标志。其他土著民族^[1]仍然留在西部和西南部。当然不应忘记，中国人同原住民的关系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今，已经将近5000年了，而罗马帝国及其所征服的民族存续的时间，只不过其十分之一。外敌包围中的罗马世界解体了。中国却增强了力量和内聚力，地位牢不可破。这个确凿的事实，就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可追根溯源的差异。

中国独自发展。——喜马拉雅山脉关闭了南方。西伯利亚和蒙古封住了北方。东方是浩瀚的太平洋，而中亚地区的距离与逐渐干旱则使得与西方国家的交通日益艰难。无论怎样判断中国人的起源，也不管他们从祖先的家园带来过什么进步的萌芽，大体可以确定，他们在最初基础上建立的结构，就是他们自己的。他们的征服，是凭借自己的骁勇，他们可以为自己所创造的中国而骄傲。她的文明是她自己独有的。她所做的一切，都出于自己的特立独行。她屡战屡胜，而且至今“仍不出局”。在一些西方国家从野蛮人中崛起之前数千年，她的生存就完全按照国家的经典文献，享受着卓越艺术和手工艺的社会生活，以及人类的绝大多数望尘莫及的高度文明。然而，尽管中国处于隔绝状态，其发展仍在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接近，或者

[1] 原尾注：第2页第6行：“土著民族”。

丁甦良博士提供了这些民族传统名称的四重清单：南蛮，东夷，北狄，西戎。现在已知的有倮倮部落、苗子、夷家、客家、福老、瑶族、畲族、傣傣、民家、西番。（理查德：《综合地理学》[*Comprehensive Geography*]；库寿龄：《中国百科全书》[*Encyclopedia Sinica*]）